

中国书法鉴赏·第二辑

蔡襄书法鉴赏

ZHONGGUO SHUFA JIANSIANG

紫都俞伽 编著

十月廿日襄顿首别已
经年每冰池间但忆
故之怀念至承书窥揽
磊磊兰襟感著友间
郡月清不插意冲情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HINA TRANSLATION AND PUBLISHING HOUSE

中国书法鉴赏

蔡襄书法鉴赏

紫都 俞伽 编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蔡襄书法鉴赏/紫都 俞伽编著.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3

(中外书画大师书系·中国书法鉴赏 第2辑)

ISBN 7-80109-933-8

I. 蔡... II. ①紫... ②俞... III. 汉字-书法-鉴赏-中国-北宋 IV. J292.1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15348号

蔡襄书法鉴赏

紫都 俞伽 编著

责任编辑 谭洁 王雪孟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社址 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内冠英园西区22号(100035)

电话 66560272(编辑部) 66560273, 66560299(发行部)

网址 <http://www.cctpbook.com> Email: edit@cctpbook.com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振宏福利印刷厂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80

版次 2005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 250.00元(全十册)

目 录

第一部分 慷慨大体能者谁

——蔡襄生平传略	(1)
书艺高深	(4)
忠君惠民	(10)
心正品高	(13)

第二部分 作品赏析

(15)

与杜长官帖	(17)
谢郎帖	(30)
与当世帖	(39)
与陈茂才帖	(42)
与大姑帖	(44)
进诗帖	(48)
与颜猷帖	(71)
与郎中帖	(74)
与安道帖	(77)
与宾客帖	(80)
楷书尺牍	(83)
澄心堂纸帖	(87)
寒蝉赋	(89)
与公瑾太尉帖	(93)
跋颜真卿告身帖	(94)
自书诗札	(111)

自书诗·····	(113)
草书尺牍·····	(139)
十一月帖·····	(146)
扈从帖·····	(149)
大研帖·····	(154)
脚气帖·····	(159)
陶生帖·····	(160)
山堂帖·····	(163)
门屏帖·····	(164)
连日山中帖·····	(165)
北苑十咏·····	(168)
虚堂诗帖·····	(171)
入春帖·····	(176)
贫贤帖·····	(178)
思咏帖·····	(179)
虹县帖·····	(181)
山居帖·····	(185)
茶录(历史博物馆藏本)·····	(187)
蒙惠帖·····	(208)
紆问帖·····	(211)
暑热帖·····	(213)
京府帖·····	(215)
县君帖·····	(217)
南归帖·····	(219)
谢宋丈诗帖·····	(221)
刘蒙伯墓碣文·····	(225)
穷秋帖·····	(227)

京居帖·····	(234)
奉橘帖题跋·····	(236)
秋暑帖·····	(237)
昼锦堂记(历史博物馆藏本)·····	(239)
梁萧子云出师颂跋·····	(242)
王献之洛神赋跋·····	(243)
茶录墨迹本·····	(245)

第一部分 慷慨大体能者谁

——蔡襄生平传略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的宋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封建割据，汉族政权又重归于统一，由此中国社会便又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代。

赵宋王朝是一个有着浓厚的艺文传统的朝代。这种传统实际上从奠定佑文政策的赵匡胤时就已经开始了。赵匡胤是一介武夫，却很懂得文治的意义和文化人的重要。据传，当初赵匡胤黄袍着身之后曾秘密地制作了一块“誓碑”，誓词共有三条，其中一条就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此事不见于正史，但不管它是否确切，“不杀士大夫”的说法与宋代历史则基本符合。从总体上看，其它朝代士大夫动辄被杀头情况，在宋代不存在。对文人的爱护和尊重，实质上是对文明和才学的敬畏。正是这种敬畏促成了宋廷佑文的基本国策。

宋朝历代帝王，大都是不擅军事的文弱儒雅者，这种状况，虽不足以开边拓土，御敌抗扰，却助成了文化艺术的繁荣。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云：“帝即位，异姓王及带相印者不下数十人。至是，用赵普谋，渐削其权。或因其卒，或因迁徙致仕，或以遥领他职，皆以文臣代之。”（《宋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太祖奉行的这一政策，本意唯在制约、削弱异己势力，稳定、加强皇权。但却因文人执掌权柄，而产生了文学艺术的“解放”运动，为宋代书法艺术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宋代帝王自太宗开始便形成了嗜书的风习。据《宋太宗实录》记载，太宗尝召葛湍，问徐铉对自己书法的看法如何，湍曰：“铉留心篆籀，不闻圣草。”太宗又问：“铉尝见朕书否。”湍曰：“臣僚非赐诏，无由得观。”太宗非常高兴，拿出御书二纸曰：“一以赐汝，一以赐铉。”（姜澄清《中国书法思想史》）这种情况，到徽宗时更加盛行。由

于制度的影响,帝王的钟爱,文人的趋慕和社会各阶层的需求,使宋代的书法艺术自唐之后又一次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并明显地呈现出多元的形势,真可谓盛况空前。

宋廷对文治的重视和对文人的尊重,形态化为以科举取士为中心的一整套文官制度,从而在社会上造成了一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普遍风气,读书学文成了进入上层社会的必经之路,文化和艺术的修养成了上层社会人士必备的条件和标志。

两宋时期,从帝王勋臣、文士释徒到青楼女子,都不乏善书之人。在高手名师当中,以北宋四大书家苏、黄、米、蔡最为著称,其中的蔡襄则以其高尚的人品和书品被誉为“当时第一”。

蔡襄(1012~1067),字君谟,兴化仙游(今福建)人,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甲科第十名及第。庆历三年(1043年)知谏院直史馆,后兼修起居注,进知制诰,又以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再知福州,徙知泉州,至和元年开始设计建筑洛阳桥,历时七年竣工,桥长3600尺,宽15尺,47孔,耗资1400万钱,为有宋以来的宏大建设工程。治平二年(1065年)以端明殿学士谪守杭州知府,治平四年(1067年)病逝,享年56岁。宋孝宗乾道中(1167年),谥忠惠,后人也称蔡忠惠。蔡襄不仅因为书艺精深而名传后世,而且因为学识渊博、忠君爱国、为官清正、惠民孝亲、贬斥邪佞而百代流芳。

书艺高深

作为宋四家之一的蔡襄,是一位少见的书法多面手,并以其真、行、草书皆优且概入妙品或精品而卓冠

一时。他那刚劲而富有的端厚气势，淳淡而婉美的尺牍翰墨，人皆收藏以为宝。《宋史》评曰：“襄公手书，为当时第一，仁宗尤爱之。”（《宋史》中华书局）欧阳修评曰：“蔡君谟之书，八分、散隶、正楷、行狎、大小草众体皆精。”（欧阳修《欧阳文忠集》）苏轼评曰：“蔡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化无穷，遂为本朝第一。”（苏轼《评杨氏所藏欧蔡帖》）周必大评曰：“蔡忠惠公大字端重沉着，宜为本朝书法第一，《洛阳桥记》与《吐谷浑词》皆大书之冠冕也。”（钟明善《书法欣赏》）

蔡襄不但是书艺上造诣精深的名儒，而且是品茶、制茶的专家，对于水利、造桥、植树和鉴别茶叶及栽培荔枝等也是深有调查与研究的，并且都颇有成就。

以品茶为例，我国茶事有文字记载的始于秦汉，饮茶原为贵族地主们的雅事，因唐陆羽著《茶经》而渐在民间流传。至宋，种茶、制茶和茶的贸易较唐代有了极大的发展，政府遂实行茶叶的专卖制度，并成为宋朝的一项重大收入。与蔡襄同一时代的李觏说及北宋饮茶风尚时称：“宋非古也，源于江左，流于天下，浸淫于近代，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贵贫贱靡不用也。……来有甚远，价有甚贵，而人争取之者，味美也；涂（途）有甚险，法有甚重，而人争贩之者，利厚也。”可见，茶至宋已成老幼皆宜、贵贱咸嗜的生活必需品，因而鉴茶、品茶的技术自然而然备受人们的推崇。据宋代彭乘记载：“蔡君谟善别茶，后人莫及。建安能仁院，有茶生石缝间，寺僧采造，得茶八饼，号《石岩白》。以四饼遗君谟，以四饼密遣人走京师，遗王内翰禹玉。岁余，君谟被召还阙，访禹玉。禹玉命子弟于茶笥中选取茶之精品者，碾待君谟。君谟捧瓯未尝，辄曰：‘此茶极似能仁石岩白，公何从得之？’禹玉未信，索茶帖验之乃服。”又载：

“蔡君谟，议茶者莫敢对公发言，建茶所以名重天下，由公也。后公制小团，其品尤精于大团。一日，福唐蔡叶丞秘教召公啜小团，坐久复有一客至。公啜而味之，曰：‘非独小团，必有大团杂之。’丞惊呼，童曰：‘本碾造二人，继有一客至。造不及，乃以大团兼之。’丞神服公之明审。”这两个故事，说的是蔡襄鉴别茶质本领之神，也是见其茶道之精。他亲撰的上下两卷《茶录》，正是他精于茶事的结晶。至于《茶录》，书以小楷，则被世人推为是历代书帖中的精品而流芳百世。

蔡襄生活的宋代，国威不振，北国不宁，比之盛唐要差许多，致使盛极一时的古代以丝绸之路主的陆上对外商道，转而移向东南沿海。随着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促使我国东南沿海商品经济的日益繁荣。海上的对外交通空前发达。广州、泉州等沿海城市，不但成为重要的港口，而且能制造出远涉重洋的大海船。在这种背景之下，靠山面海，溪流众多的福建沿海，桥梁建筑也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据《泉州府志》载，泉州一带宋建石桥达 50 座之多，未载入史籍的小型桥梁尚在其外。位于泉州北 20 里处的万安桥（俗称洛阳桥），被我国现代桥梁专家茅以升誉为“福建桥梁的状元”。该桥以工程宏伟，施工技术卓越，由一代名家蔡襄书“万安桥记”并精工勒碑岸左而驰誉中外，名垂千古。洛阳桥虽然动工于皇祐五年（1053 年）四月，而蔡襄首知泉州则在至和三年（1056 年），但该桥是建有石墩 46 座，长达 360 丈，阔 15 尺，历时七年才完成的大工程，如果没有知府首脑的鼎力支持，并与工匠高手共谋设计规划，对桥墩创造性地采用“筏型基础”（两头尖，中间大，借以减少海潮和江流的冲击力量）和“殖蛎固础”（利用当地沿海特有的蛎房繁殖填粘石缝，以胶固石

墩,并兼有发展牡蛎养殖业之妙)的先进造桥技术,那么纵有造福于民的良好愿望也难成就此千秋伟业。实际上,此前的洛阳江,几乎是福建东南沿海南北交通的天堑。人们仅能凭船而渡,岂止不便,更因江宽流急,十渡九覆,货倾人溺之祸事屡见不鲜。为此架桥以保民“万安”之仁德行为不胜枚举,然而均以失败而告终。由此可见,蔡襄与其能工巧匠们,正是以其卓著的才能和超凡的智慧,为我中华民族跻身于世界桥梁建筑史上的先进行列作出令人骄傲的贡献!还值得一提的是,近千年前,有如此成就的浩大工程,耗钱达1400万之多,竟然不花国库分文全凭募捐集资兴建。事举而民不怨,其过人的才智和忠惠于民的业绩更令人叹服不已。为此人们编有谚语故事,赞美蔡襄的丰功伟绩,并有谚谣曰:“若要此桥成,除非蔡端明。”

蔡襄还十分重视植树造林和兴修水利。“蔡密学襄知(福)州日,令诸邑道旁皆植之(松),又自大义渡夹道达于泉、漳,人称颂之,诗曰:‘夹道松,夹道松,问谁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摇清风。’”此即《宋史·蔡襄传》中所称的“植松700里”。“嘉祐二年(1057年)十二月,蔡密学襄命(福州周围)三县疏导渠浦……开淘护城河浦176,计21976丈;均用民力,凡89000,溉田3600余顷。”他还在兴化军西南兴修水利。“蔡君谟,兴水利灌民田,引水浇壶公山。”他身为福建路转运使时,曾访察并闻得兴化军莆田县原有陂塘可灌注沿海盐碱地千余顷,至八千余家可借以耕作为业。但大中祥符年中之后,古五塘逐渐被放了水,易塘为田,导致“旧日仰塘水灌注”之沿海盐碱地“尽皆焦旱”,“人户逃移,见居者只括土煎盐”,难以度日,并因交不起税赋而不得不“枉陷刑狱”。那沿海千余顷田地以及

五塘之存亡,与蔡襄“本家及亲戚无有一亩相连”,但他依然为民请命,上《乞复五塘札子》,请皇上准其“选清强一员,取索应是干连案卷看详,亲诣五所陂塘处夺闻奏。如与臣所陈利害稍同,乞赐除落塘内新定产钱,依旧积水为塘,利济民产”。总之,植松,开渠,复五塘之举,可以庇道路,荫行人,灌田地,济万民,惠及当朝,福荫后代,这是显而易见的。

此外,蔡襄对荔枝这一江南名果也有着细致的观察和精确的研究,从他那清迢粹美的《荔枝谱》中就将其卓越的才识跃然纸上。“荔枝食之,有益于人。《列山传》称:‘有食其华,实为荔枝。’《仙人本草》亦列其功。葛洪云:‘蠲渴补髓。’所以唐羌疏曰:‘未必延年益寿。’盖云虽有其传,岂果能哉,亦谏止之词也。或以其性热,人有日啖千颗,未尝为疾。即少觉热,以蜜浆解之。其木坚理难老,今有 300 岁者,枝叶繁茂,生结不息,此亦其验也。”“初种畏寒,方五七年,深冬覆之,以护霜霰。福州之西三舍曰水口,地少加寒,已不可植(殖)。大略其花春生簌簌然,白色。其实多少,在风雨时与不时也。有间岁生者,谓之歇枝;有仍岁生者,半生半歇也。春花之际,傍生新叶,其色红白。六七月时,色变绿,此明年开花者也。今年实者,明年歇枝也。最忌麝香,或遇之,花实尽落。其熟未经采摘,虫鸟皆不敢近。或已取之,蝙蝠蜂蚁争来蠹食。园家有名树,旁植四柱小楼,夜扑其上,以警盗者。又破竹五七尺,摇之答答然,以逐蝙蝠之属。”以上是其对食用与栽培、管理等知识的论述,然而对于荔枝分类也非常精辟。如《荔枝谱》中所叙:

陈紫:因治居第平窠,坎而树之。或云,厥土肥沃之致。令传其种子者皆择善壤,终莫能及,是亦赋生之异也。

江绿：大较类陈紫而差大，独香薄而味少淡，故以次之。其树已卖叶氏，而民间犹以为江家绿云。

方家红：可径二寸，色味俱美，言荔枝之大者莫敢拟。岁生一二百颗，人罕得之。方氏子名纂，今为大理寺丞。

游家紫：出名10年，种自陈紫，实大过之。

宋公荔枝：树极高大，实如陈紫而小，甘美无异，或云陈紫种出宋氏。世传其树已300岁。旧属王氏，黄巢兵过，欲斧薪之，王氏媪抱树号泣，求与树偕死，贼怜之不伐。宋公名誠，公者老人之称，年逾八十，子孙皆仕宦。

蓝家红：泉州为第一。蓝氏兄弟，主为太常博士，丞为尚书都官员外郎。

周家红：独立兴化军30年，后生益奇，声名乃损，然亦不失为上等。

何家红：出漳州。何氏世为牙校尝有郡将全树买之，树在舍后，将熟，其子日领卒数十人穿其堂房，乃至树所。其来无时，举家伏藏，欲即伐去而不忍。今犹存焉。

法石白：出泉州法石院，色青白，其大次于蓝家红。

绿核：颇类江绿，色丹而小。荔枝皆紫核，此以绿见异。出福州。

圆丁香：丁香荔枝皆旁蒂，大而下锐，此种体圆，与味皆胜。

蔡襄对荔枝的研究既深又透，他能掌握32种之多的品类，对其产地、种植、管理的异同，以及每种特征（从颜色、大小、多少、病虫害的预防与根治等）论述得十分精辟，真是一部科学专著。

忠君惠民

谥号曰“忠惠”的蔡襄，当然有其既忠又惠的政绩，除上述植树、治水、造桥安民、深研茶叶与荔枝的栽培管理等德政之外，下述三篇“戒文”、“四贤一不肖诗”和直言极谏之事，足看出其人之忠惠。

蔡襄二知福州，作过《山头斋会戒》和《五戒》文。

当时闽俗重凶仪（治丧）、奉浮图（佛事），每逢亲人亡故，为迎宾客，饭僧徒而立券、举债、典屋、卖田，直至破产而发丧，为此，蔡襄作《山头斋会戒》。戒文称：“被丧之家，有靡用破卖产业，置办酒食斋筵，名为孝行，”实“是不孝之人”；“邻里识与不识，尽来吊问，恣食酒肉，包携归家，至使丧家费用无极”；本无哀情的僧俗，亦趁机斋食丧家，“此与乞丐何异”？并斥之为“是无耻之人也”；最后下了禁令：日后“丧葬之家，丧夜宾客不得置酒宴乐，山头不得广置斋筵聚会，并分散钱物以充斋价。如有辄敢，罪在家长，并城外僧院，不得与人办置山头斋”。谁敢破“戒”必须治罪。透过这严厉的法治，不难体察到蔡公爱惜民力的一片赤诚之心。

这种宣明教化，恤民厉俗之惠政，在其所作的《五戒》中有更充分的体现。《五戒》之要曰：一戒为父母者厚薄（偏心）于己子；二戒为人子不尽孝（生不尽养，死而妄费）；三戒兄弟手足因娶妇或临财而失同胞情爱之天性；四戒娶妇而直求资财；五戒农人兼并（并吞他人土地）、商贾欺漫，大率刻剥贫民，罔昧神理。一篇 469 字的《五戒》，言简意赅，如诉家常，晓人以理，真可谓文章道德皆足以垂世传后。

晚年，蔡襄在家世孤贫，母氏思归的情况下，并以

体弱多病之躯徙知杭州。尽管杭州风景秀美绝伦,然而他忠于职守,忙于吏事,以至“至杭未尝游览”。在杭州时他仍然以待子民如父母为己任。据《福州外纪》载:“杭州每年八月十八日潮生,郡人聚观,善泅者溯涛出没,谓之弄潮宋治平中,郡首蔡襄遂作《弄潮文》。”该文言简意赅地指出:吴越一带,惟江涛海流最凶猛,八月秋风益发使潮高浪险。然而,浙东民俗,在观潮时,善泅者竞相以弄潮为戏,夸耀于人,结果往往葬身鱼腹,造成人死家难。为此,蔡郡守戒曰:“所有今年观潮并依常例,其军人百姓辄敢弄潮,必行科罚。”对照上述两篇戒文,所作的时间、内容各异,然而,“三戒”透露的拳拳爱民之心和谆谆教诲之情,以及运用手中的“权”,施以法治,不为谋私,而是用以助其敦厉陋俗的用意则是一脉相承的。

其实,蔡公向以勤于政、惠于民为本,足迹所及,到处皆然。仁宗时,他以“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襄精于吏事,谈笑剖决,破奸发隐,吏不能欺”。因此,欧阳修曾赞曰:“开封府世称省府,为难治,而易以毁誉,居者不由以迁,则由以败,而败者十常四五。公居之。皆有能名。”原来蔡公不但未败于“难治”,相反,竟能于至和中和嘉祐五年(1060年)一再知是府,足见其政绩之卓著。

作为贤臣,蔡襄不仅行政惠及庶民,而且忠朝纲直言极谏,在朝事政务等大是大非面前,他是从来不计较个人荣辱和得失的。

如吏部员外郎范仲淹因为在皇帝面前讥刺误国的权臣(宰相吕夷简)而遭贬谪,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和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洙,因先后上书为范仲淹辩护而被同贬;馆阁校勘欧阳修因此写信给右司谏高若讷,谴责他不但没能为难得的人才——范仲淹辩白,反而在

仁宗面前进谗言，落井下石，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这一来，恼羞成怒的高若讷当然不会放过欧阳修。欧阳修终于难逃“坐谴”厄运。一时间，朝野之奸邪，就以“朋党”为棍棒，斥异己，清君侧，害忠良。在那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妖风和毒雾下（范仲淹坐贬而离开汴京时，众多的臣僚亲友几乎不敢往送，足见“白色恐怖”的程度了），身为馆阁校勘的蔡襄，竟敢针对时弊，作《四贤一不肖诗》（四贤指范仲淹、余靖、尹洙和欧阳修，一不肖指高若讷），其鲜明的爱憎，溢于言表，锋芒所指的后果，无疑是不堪设想的。这是何等的大无畏的精神啊！正由于他有如此清刚正气，这首铮铮的诗章，一经问世，便赢得“都人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于幽州馆”的殊荣。后来仁宗皇帝终于觉悟，而更用辅相。“庆历三年（1043年），仁宗亲擢靖、修及王素为谏官。襄又以诗贺，且勉之。三人者，以其诗闻于上，帝亦命襄知谏院。襄喜言路开，而虑正人难久立，乃进一步上疏曰：‘朝廷增用谏臣，而修、靖、素一旦并命，朝野相庆’”。蔡襄“恐邪人”当道，而使“忠诚刚正的谏臣”难久立，因此进一步论述了“任谏”、“听谏”和“用谏”的各有易难的辩证关系，并进而劝谏仁宗做个名副其实的“好谏”和善于“纳谏”的明君。而作为谏臣，则应做到不怕丢官甚至遭杀身之祸也应“无所回挠”地上疏极谏。在蔡襄看来，这正是为人臣应有的“忠”。早在蔡襄“入谏省时，年尚少……以为见事不言非为臣之道”。这就是说，为了社稷的兴盛和庶民的福利，他宁可丢官下狱也要进言的。如“时有旱蝗、日食、地震”等自然灾异，蔡襄就直言谏道：“灾害之来，皆由人事，君臣上下皆阙失”，以致“疏出”，“闻者皆悚然”。